

周叔弢与海源阁遗书

王 绍 曾

从1927年冬聊城杨氏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将宋元秘本捆载到天津出售，接着1929、1930年连遭匪劫，海源阁遗书从此星散人间。当时海内有识见的藏书家都很清楚，海源阁遗书大抵来自清初毛、钱、季、徐，号称惊人秘笈，所以一开始，便千方百计争取购致，形成一时的“海源阁热”。某些缺乏资财的藏书家，见到一眼海源阁遗书，也必记其版式、行款、评跋。而虎视眈眈、窥伺在一旁的，更有类似岛田翰那样的东邻覬覦之徒。因此，海源阁遗书落入谁家之手，是要经过一番角逐的。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最大的得主，是以济宁潘氏（潘复，字馨航）为首的存海学社，他们购得了杨敬夫抵押在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珍本。其次是江安傅氏（增湘字沅叔），德化李氏（盛铎字椒微，号木斋），衡阳陈氏（清华，字澄中），南海潘氏（宗周字明训），掖县刘氏（少山），吴兴张氏（张均衡之子乃熊，字芹伯，一字近圃），东莞莫氏（伯骥，号天一），日照王氏（猷唐），南宫邢氏（之襄，字赞亭），以及北平图书馆、大连图书馆。他们都各有所得，多的达数十种，少的三、四种。其中东至周叔弢先生独得58种，而且绝大部分是精品。其数量仅次于存海学社的92种，而质量则有过之，无不及。这些遗书其中大连图书馆所得者，由日人购置，大连解放时尚妥善保存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竟遭散失；德化李氏木犀轩所得，转归北京大学图书馆；日照王氏所得归山东省立图书馆，现存山东省博物馆；其他收

藏，基本上都已归入北京图书馆。其中一部分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。总地看来虽然有的流失，然大部保存完好。这应该说是我国藏书史上的一大幸事。

关于周叔弢先生与海源阁遗书，我在《海源阁书目五种》（正在齐鲁书社发排）《后记》中已经作了记述，但我所见到的只是冀淑英先生编的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，了解是很不够的。特别是对弢翁收购海源阁书的某些细节和来龙去脉，[根本不知道。当周一良先生知道我在整理《海源阁书目五种》时，先寄给我《周叔弢传》（周慰曾著，北京师大出版社1994年版）和《弢翁藏书活动四录》（天津图书馆编，1994年版）；在1994年冬赴美探亲前夕，又让他的介弟景良先生寄来弢翁《楹书隅录》题识和批注的过录本和复印件，使我对弢翁与海源阁遗书的关系，以及购书的前前后后，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
首先，我发现弢翁对海源阁遗书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爱好。根据现有资料，弢翁见到的海源阁遗书较任何一个藏书家为多。

《楹书隅录》、《楹书隅录续编》，共计著录宋元秘本268种，其中宋本85，金元本39，明本13，校本107，抄本24。弢翁未见者仅宋本7，金元本16，明本3，校本40，抄本11，共计77种。其余191种，全都寓目，而且作了精细的批注。此外，在《楹书隅录》和《续编》之外，见到宋本6种，元本1种。合计过目者达198种。在近现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中，见到海源阁书最多而有题记的，首推傅沅叔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了67种，都详细地记录了宋元校抄的版式、行款、评跋，并对某些杨氏误定的版本作了订正。其次是王有三（重民），见于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和《补编》的，共计33种。赵斐云（万里）虽然见到的海源阁书最多，但见于题记的只有10种。如果以弢翁与傅沅叔相比，弢翁较傅沅叔多见131种，这个数目不少。弢翁第一次见到海源阁书是在1927年10月。以后每有所见，都在《楹书隅录》和《续编》上加以批注。这说

明，弢翁对海源阁书的关注远在别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之上。1937年11月，他在《楹书隅录》题识中说：“十年前读此录，念诸书如天际真人，只涉遐想。近杨氏书有散出者，乃得略见一斑，不能不自矜眼福，惜财力有限，索直太高，未克多有所获，为怅怅也。”可见他把海源阁书看成是“天际真人，只涉遐想”，迨杨书散出后，“略见一斑”，又“不能不自矜眼福”。1938年9月，他见到宋本《周易本义》，因为没有买到手，自叹“只饱眼福而已，伤哉！”这种思想感情，在题识中屡见不鲜。弢翁在1944年5月9日元本《注心赋》的题识中，盛赞“杨氏藏书，皆善保旧装，不轻改易”，1939年12月在《楹书隅录》的另一则题识中说：“杨氏书初出时细审之无一指爪痕，想见当年藏书之谨慎，敬夫未克严守此戒，传之者多非真知竺好之人，不知毁却多少好书矣。”在许许多多收购海源阁遗书的藏书家中，真正对杨氏书有那样深刻认识的，除弢翁外，几乎没有第二人。按照弢翁的设想，海源阁遗书，应该归到“真知竺好之人”手里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所谓“真知竺好之人”，当然是懂书、爱书、读书、校书、嗜书若命的人，既不是居奇鬻贩的书估，又不是附庸风雅的邛上豪门，广中洋贾。在弢翁看来，杨敬夫“未克严守此戒”，不免“毁却多少好书”，言外之意，为海源阁遗书含冤叫屈。这不但是弢翁对海源阁遗书“真知竺好”的自我表白，而且充分反映了他的真实的思想感情。在弢翁对海源阁遗书的两则题识中最能体现他的“真知竺好”。一则是宋鹤林于氏家塾楼云阁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。此书原为三十卷。据弢翁说“此书为海内孤本，世所罕见，不仅纸墨莹洁，光采夺人为可贵重。丙寅岁（1926），余始见四卷于北京翰文斋（卷二、卷十七、卷十八、卷二十一），时初从临清徐氏散出，议价未成，卒为德化李氏所得，时时念之不能忘。而项城袁氏所藏一卷（卷二十六），则辗转归庐江刘氏，未之见也。乙亥（1935）夏，杨君敬夫忽以残本

二十三卷见示，为之惊喜过望，以重值收之。此书杨氏先德光绪辛丑（1901）年得于北京，当时已逸七卷，制榑时乃预为之地，盖以期他日之复合也。余于是亟从李氏购所藏四卷，其值倍于杨氏。十一月游北京，偶过文禄堂，见第十四卷影片，询知原书藏石氏，因挽文禄堂主人王晋卿图之，复驰书伯兄上海，乞商刘晦之丈让所藏第廿六卷。丙子（1936）正月，王晋卿以石氏书至，已改易旧装，而值更高于李氏。若刘氏之一卷，则秘为鸿宝，坚不肯让，数年来屡以为请，皆拒而不允。其第十卷更无踪迹。噫，此书或将不能终完耶？！余前数年收宋岳氏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亦偶然配合，凡历三年。其第一卷则失之交臂，且闻毁于壬申（1932）上海闸北之变。今刘氏书散佚过半，剑合珠还之愿，更不可期，得失聚散，固有定数，非人力所能强，第衷心耿耿，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耳。”由于杨敬夫“以残本二十三卷见示”，引起他向李氏、石氏、刘氏收购缺卷，希望这个世所罕见的海内孤本能够延津剑合，成为完书。直到写题识时为止，刘晦之收藏的第廿六卷，虽然百般蒐求，始终未能剑合珠还，因此“衷心耿耿，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在刘晦之藏书“散佚过半”的时候，弢翁终于购到了梦寐以求的第廿六卷。尽管弢翁没有在这则题识后再加附记，弢翁的踌躇满志是可以想见的。从光绪辛丑（1901）杨氏先德得残本二十三卷到民国壬申（1932）弢翁写题识为止，相隔三十一年，杨氏先德制榑时竟预为之地，以期他日复合，在三十一年的弢翁手里，竟然成为事实。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，而是藏书史上无独有偶的佳话。只有弢翁才能体会到杨氏先德“制榑时预为之地”的心情，完成了杨氏先德未能复合的宏愿。弢翁与杨氏先德可谓心心相印。这难道不是弢翁对海源阁遗书“真知竺好”的最好见证。

另一则反映弢翁对海源阁遗书“真知竺好”的是对元本《复古篇》的处理。元本《复古篇》是海源阁劫后流入天津某茶叶铺

的一部书，宋元旧刻传世极稀，诸家书目著录的多为抄本，此为元至正六年吴志淳好古斋刻本，字画精雅，宋讳阙笔，盖从宋本翻雕。弢翁于1934年11月以重价购自藻玉堂王子霖。弢翁因“惜纸经染色，触手即破，乃命工重装，围以素纸，居然面目一新，”不但便于观览，书之寿命亦得以延长。弢翁自己在题识中说，这样做，“固无嫌于损旧装矣”。这就清楚地表明，弢翁对海源阁遗书，一定要恢复旧装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会感到不安。类似的情况，还表现在对元本《注心赋》的处理上。弢翁在元本《注心赋》的题识中说：“近年颇见杨氏藏书，皆善保旧装，不轻改易，此书则因辗转流传，遂横遭割裂，而装池更污损非复旧观，既命工略加补缀，爰记数语以寄慨。”弢翁目睹海源阁遗书“横遭割裂”，“装池污损”，“非复旧观”，从内心中感到痛惜，这是不难理解的。十分难得的是，他跟杨氏三代先德一样象爱护自己的头目那样爱护海源阁遗书。这不仅是杨氏的功臣，而且是杨氏异代的知音。我在上面曾经引证弢翁在《楹书隅录》的一则题识中指出“杨氏书初出时，细审之，无一指爪痕，想见当年藏书之谨惜”。这件事在弢翁看来极不寻常。这一方面体现了弢翁对杨氏藏书的高度评价，另一方面体现了弢翁的精细观察，就连有没有指爪痕这样的问题，也提到保护藏书的原则上来认识。如果不是弢翁对海源阁遗书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爱好，他能这样做吗？！

其次，意识到弢翁收购海源阁遗书，在他的整个藏书活动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傅沅叔在《周君叔弢勘书图序》中说他“旅津二十余年，殖业余暇，无日不以访书为事。厂肆之人，若舟之估，麇集其门，内而天府馆库之旧储，外而南北故家所散逸，珍异纷罗，供其采择”。可见弢翁购书，并不限于海源阁遗书，但毫无疑问，海源阁遗书在他收藏的宋元校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根据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著录的善本书，计715种，

12672册，其中明确记载来自海源阁的为52种，根据弢翁《楹书隅录》的题识，尚有下列5种，均属海源阁遗书：

1.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 宋鹤林于氏家塾楼云楼刻元修本（存二十九卷，一至九，十一至三十），内有二十三卷得自杨敬夫。

2.《长安志》二十卷《图》三卷 明成化四年邵阴书堂刻本，黄丕烈跋。

3.《山海经》十八卷 明成化元年吴宅抄本，吴宽跋。

4.孟东野文集十卷 南宋蜀刻本（存一至五卷二册），周香严校宋本跋，黄丕烈跋。

5.花间集十卷 宋刻递修公文纸本，杨保彝题款。

这样，海源阁遗书应该是57种。这57种如果以版本分，宋本23，金本1，蒙古本1，元本8，明本2（其中明铜活字本1），校本16，抄本6。在23个宋本中，最负盛名的有：

1.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《周礼注》十二卷，这是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。

2.宋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刻公文纸印本《新定三礼图集注》二十卷，为华夏真赏斋、季振宜、徐乾学递藏，《真赏斋赋》著录。

3.宋鹤林于氏家塾楼云阁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号称海内孤本，世所罕见。

4.宋本《建康实录》二十卷，为绍兴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撫使司重刻北宋嘉祐本，旧藏毛氏汲古阁，继为季振宜、徐乾学所收藏。

5.宋刻本《晋书》一百三十卷，字近瘦金体，遒劲有力，纸墨版式，纯系南宋初叶建本风格。

6.宋刻本《新序》十卷，为绛云楼未焚之书，后入《延令宋版书目》，《百宋一廛赋》说它“庚寅焚如，历劫偏完，裨益是正，奚

止一端，髯兮侈富，于兹寒酸。”可见它在宋版中的出类拔萃。

7. 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《山海经》十八卷，为传世最早刻本，世无二帙。

其他如北宋蜀刻小字本《王摩诘文集》十卷，南宋蜀刻本《孟东野文集》（存一至五卷），前者为明袁褧、项墨林所递藏，后归汪士钟；后者为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，为汪士钟、郁松年所递藏，均属蜀本中的佼佼者。在宋本中尚有《常建诗集》二卷，

《岑嘉州诗》八卷（存一至四卷），《皇甫冉诗集》二卷。而宋嘉泰淮东仓司刻本《注东坡先生诗》（存卷四十一至四十二追和陶渊明诗）。宋刻公文纸印本《花间集》尤为难得。此外尚有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张宅晦明轩刻本《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》一百二十卷（即弢翁所指金本《通鉴节要》），为毛氏汲古阁、季振宜、怡府所递藏。在元刻本中，脍炙人口的有：雪窗书院刻本《尔雅》三卷，元至正六年吴志淳好古斋刻本《复古编》三卷，元刻本《注心赋》四卷，元刻本《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》二卷，《续集》一卷，元大德刻本《筠溪牧潜集》七卷，元至大刻本《梅花字字香》二卷，元至正刻本《梅花百咏》一卷，元延祐七年叶曾南阜书堂刻本《东坡乐府》二卷，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《稼轩长短句》十二卷。在明本中，有明建业张氏铜活字印本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二卷。在名家校本、抄本中，除《广雅》十卷，为顾广圻、黄丕烈校跋本外，如《都城纪胜》一卷，《衍极》五卷，《画鉴》一卷，《糖霜谱》一卷，《春渚纪闻》十卷，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三十卷，《录异记》八卷，《李群玉诗集》三卷，《后集》五卷，《蜕庵诗》四卷，《乐府阳春白雪前集》四卷，《后集》五卷，均系黄丕烈校跋本，《佩觿》三卷，为毛抄毛校，《钓矶立谈》一卷，为何煌校本，《干禄字书》一卷，《字鉴》五卷，均为毛抄本，《新加九经字样》一卷，为席氏影宋抄本。总起来看，弢翁收藏的海源阁遗书，都

是经过精细的鉴别，在流传原委中大抵均有端绪可寻。在谈到弢翁的藏书活动中，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他的“双南华馆”和“陶陶”的分而复合的韵事。1931年前弢翁从文在堂魏子敏处买到一部宋本《南华真经》，这是他收得海源阁书的第一部。眉端有宋人朱墨笔批校，有“功甫借观”、“开卷一乐”、“宋本”、“汪印士钟”等印，为海源阁藏书中的珍品。但海源阁尚藏有金刻本《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》十卷（弢翁据《楹书隅录》定为宋本）。此书有文彭、吴元恭题款，由季振宜、徐乾学递藏，弢翁志在必得。在1931年10月的题识中，于宋本《周礼》后提到这部分。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磋商，终于在1943年春从杨敬夫手中买到这部书。弢翁认为这两部《庄子》，合则两善，因名其室曰“双南华馆”，并倩刘叔文为其治印（见《弢翁藏书活动四录》附《弢翁印选》）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谈到“陶陶”的分而复合，更有一段曲折的经历。所谓“陶陶”，是指海源阁旧藏的两部宋版陶诗，一部是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，有金俊明、孙延题签，汪骏昌跋，题签是元人手笔，1931年得自杨敬夫。另一部是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，《补注》一卷，宋汤汉注。所以简称《汤注陶诗》。有周春、顾自修、黄丕烈跋，孙延题签，1933年11月得自藻玉堂王子霖。这部《汤注陶诗》，字体秀逸，镌刻甚精，黄纸初印，每册首尾都用金粟山藏经笈宋人写经作护叶，书匣是黄丕烈士礼居原物，已经十分珍贵。更重要的是这部书有它自己的流传故事，在藏书史上引人瞩目。据乾隆丁未（1787）顾自修题记，这部书原在藏书家鲍廷博处，鲍不知汤汉是何许人。乾隆辛丑（1781）四月，他在另一藏书家周春处提到这部书，周连称好书，并问书在哪里，鲍说已卖给海盐张燕昌（芭堂）了。周即从张处借观，张显然也不知道这部书的好处，只见书面是宋朝金粟山藏经笈，疑心它是一部好书，所以索还甚急。周要他出让，经友人从中说

合，经过两年，到乾隆癸卯（1783）五月，才由周用明朝叶玄卿“梦笔生花大圆墨”和张换得。周春得了此书，把它跟一部宋版《礼书》放在一起，取名“礼陶斋”，以视宝爱，并打算用这部书来殉葬。后来《礼书》先卖出，改斋名为“宝陶室”。最后于嘉庆戊辰（1808），又将《陶集》卖去，再改斋名为“梦陶室”。黄丕烈早已听说这部书。书从周家卖出后，他就跟踪购买，先出四十两银子，但被别人捷足先登，没买到。后来又通过朋友向买到书的人借来，久经磋商，才以一百两银子买到手，跟他藏的宋本《陶渊明集》放在一起，取了“陶陶室”的斋名。从此成为藏书史上的一大故实。黄丕烈的题识中说，据闻周春在“去书之日，泣下数行”，从他“屡易颜室之名，亦可想见其情矣”。可见周春出售这部书，实在出于无奈。黄丕烈得到了，自然格外珍惜。令人惊奇的是：道光间黄书散去，这两部《陶集》，先后为杨以增所得。大约八十年后，杨书散去，弢翁先买到《陶渊明集》，而《汤注陶诗》，被藻玉堂王子霖买去。王子霖知道弢翁历来不愿好书失群，所以有意居奇抬价，丝毫不让。最后于1933年以大洋四千元的高价成交，使“陶陶”分而复合，安然为自庄严堪所收藏。不但如此，弢翁还因为当年黄丕烈曾把宋刻施注《苏东坡集》中《和陶诗》二卷，放在“陶陶室”内，所以又向杨敬夫买下这两卷《陶诗》，使它珠联璧合，恢复士礼居的旧貌。弢翁收购《汤注陶诗》时，明知王子霖卡他的脖子，但为了保全“陶陶”，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，这是“陶陶”的大幸，对他来说，也是莫大的安慰。用弢翁自己的话说，“这是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”，这当然是弢翁的自我解嘲，但同时反映了他为了妥善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、甘愿自我牺牲的豪情壮志与强烈的责任感。弢翁在宋蜀刻本《后山诗注》的题识中说：

辛未（1931）十月中旬，因葬妙颜夫人至北京，偶过文德堂书坊，闻新获《后山诗注》宋槧残本七册，为沅叔三丈

假去，翌日造藏园请观，纸光墨采，焕耀眼目，字体古劲中有秀逸之致，与余所藏《王摩诘集》尤近，是蜀小字本之最精者。当时因文德堂主人韩左泉索值奇昂，未敢问鼎。岁暮，韩以书来谓可贬值，北平图书馆曾许国币七百元。余乃从人借贷，倍其数偿之。同辈甚詫其痴而讥其大费，余则以为人生几何，异书难遇，后山诗又余所酷嗜，篋中旧藏任注只明弘治杨一清刻本、嘉靖梅南书屋本、季松耘校瞿氏藏宋本，若宋刻则世所罕见。黄莞圃搜访二十余年，仅得一卷，已称胜逾百朋，爰日精庐抄补前三卷本，有刘辰翁序，其雕印或在宋元之间，比之此书，固当远逊。且以弘治本与此本校，其详略多异，聚珍本复与弘治本不同。《后山诗注》盖具三源，今其二皆有流衍，独此南宋初蜀中刻本久佚于世，恐遂为人间孤本，真当景星卿云视之，奚暇为财物计耶。

在弢翁看来，“人生几何，异书难得”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祖国文化遗产中的“人间孤本”值得宝爱的。这则题识，很可能作为高价收购宋本《汤注陶诗》的注脚。无怪在他向国家献书以后，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满腔热情地对他说：“您把最心爱的‘两陶’集都献了出来，真是毫无保留，难得！难得！”从这件事来看，说明海源阁遗书对弢翁来说是多么地重要。

其三，从弢翁的《楹书隅录》和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的题识中，体会到弢翁收购海源遗书来之不易。弢翁的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悲的思想感情，完全沉浸在海源阁遗书之中。弢翁与海源阁遗书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反映了弢翁对海源阁遗书的向往和执着追求。在弢翁一生的题识中，最多最详细的莫过于对海源阁遗书的题识。在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所附《弢翁藏书题识》中，弢翁对海源阁遗书的题识，只有宋监本《毛诗》、宋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元本《复古篇》、元本《注心赋》四篇，自然是不完全

的。当我读到弢翁对《楹书隅录》和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的题识时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。这些题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记录了弢翁收得海源阁遗书的时间、来源，或得书的价格。例如：

辛未（1931）宋本《陶诗》敬夫

癸酉（1933）宋本《汤注陶诗》藻玉堂王子霖

甲戌（1934）宋本《庄子全解》敬夫

丙子（1936）宋本《唐求诗》庾楼

1936年10月明活字本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敬夫赠 三佰元

丁丑（1937）正月周香严校宋本《孟东野集》文禄 四佰元

1939年二月金本《通鉴节要》敬夫 一千三百元

1939年十二月监本《毛诗》（存一至十一）敬夫 七百元

庚辰（1940）六月 校本《博雅》斐云

甲申（1944）元本《注心赋》典臣赠

戊子（1948）正月 元本《尔雅》雪窗 藻玉堂王子霖

三千六百万元

据我统计，弢翁收购海源阁遗书，时间从1927年到1948年，跨越了21年。凡明言得自杨敬夫者25种（其中明铜活字印本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为杨敬夫所赠。）与傅沅叔易得者3种，来自赵斐云者2种，来自庾楼（张允亮）者1种，李典臣赠与者1种，来自邃雅斋者2种，来自藻玉堂王子霖者1种，来自文在堂魏子敏者1种，来自文禄堂王文进者1种，未明言来自何处者17种。共计54种。弢翁自己说“敬夫让我者三十三种（实三十四种）”，可见未明言来自何处的17种，尚有来自杨敬夫者9种。上列数字与弢翁自己谈的海源阁书来源稍有出入。可以认为，弢翁收购海源书，主要直接来自杨敬夫，也有部分来自厂估，或者出自朋友的介绍（如赵斐云、张允亮）而成交的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弢翁与杨敬夫之间的关系，非同一般。周珏良先生在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的《后记》中说：“我父亲认识了杨家后人，可以从他手中

直接买书，因为给价优惠，不巧取豪夺，书主要价低了，他总以高于所提的公平价格收买，得到杨氏的信任，想买的书大多可以买到，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。”这话是可信的。不过收购某些书的时候，由于杨敬夫索值过昂，并不是一下就能谐价的。甚至有些书因为谐价不成，落入别人的手里，弢翁只能望洋兴叹，徒呼奈何。在弢翁有关《楹书隅录》的题识中，这样的题识很多。例如：

辛未（1931）十月题：“杨氏藏书散失，合余所见所知者，盖十存八九。惟宋本《周礼》、《庄子全解》、《山海经》、北宋本《陶诗》、《二百家名贤文粹》、《花间集》、元本《梅花字字香》、《梅花百咏》、《东坡词》、《稼轩词》数种，不知落谁氏手，殊悬念耳。”

“癸酉（1933）十一月，《陶诗》来归，陶陶散而复合，书此誌喜。”

“甲戌（1934）春，《庄子全解》归我。秋八月，《周礼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东坡词》亦来归，皆孤本也。”

甲戌（1934）冬，见《二百家名贤文粹》、《花间集》、《梅花字字香》、《梅花百咏》，惜未能收得，殊怅怅也。《三礼图》尤精，《长安志》亦佳。

甲戌（1934）十一月晦日题：“书之可收而不知其踪迹者，列名如右：

《杨氏易传》宋 东莱

《礼部韵略》宋 东莱

雪窗本《尔雅》 元

《韵略》 金

《礼记》 校

《大戴礼记》 校

《博雅》 校 庚辰（1940）十月归余

淳熙本《史记》 宋 东莱
 《路史》 宋 此疑非宋本，士礼居藏宋残本。
 《輿地广记》 宋
 《国语》 校
 《历代名画记》 校
 《开元天宝遗事》 校 丙子（1936）十一月归余
 《遂昌山人杂录》 校
 《楚词》 宋 东莱
 《百家注柳文》 宋 东莱
 《昌黎先生集》 宋
 《甲乙集》 宋
 《端明集》 宋 此书恐已出国
 《鄱阳集》 抄
 《金石例》 元
 《阳春白雪》 抄
 《溢水集》 校
 《蛻庵诗集》 校 己卯（1935）售余
 《唐文粹》 校
 《杜工部集》 抄
 《昭明太子集》 校 已归李氏，非佳书。
 《陶集》 校
 《元音遗响》 校

绍曾案：以上书名下某些添注，为1934年11月以后所加，如《博雅》条注：“庚辰十月归余”；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条注：“丙子十一月归余”。注文中的“宋”、“元”“校”系指版本。所注“东莱”字样，系指书归掖县刘少山。时刘少山任天津东莱银行经理，故简称“东莱”。“甲戌（1934）十二月《梅花字字香》、《梅花百咏》、《长安

志》亦归余斋。”

“甲戌（1934）冬，《辛词》又来，诚善事也。”

“《续编》之书，散失最多，存敬夫手中者极少。所可念者，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鄱阳集》、《湓水集》、《蛻庵集》《阳春白雪》数书，未知踪迹何如耳。甲戌（1934）十一月病起书。”（在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下加注：“丙子（1936）十一月敬夫举以见赠。”）

乙亥（1935）十一月朔日题：“《说文》、《三礼图》屡与敬夫议价未成，不知终归谁何也。”

“丙子（1936）三月，澄中购《说文》去，杨氏存书中精品益少矣。十一月记。”

丙子（1936）十二月，见吕夏卿本于上海，实南宋刻，殊不及此书（绍曾案：指宋本《荀子》）之可贵，益悔交臂失之矣。

“丁丑（1937）十一月病起，又读一过（绍曾案：指《楹书隅录》），世事丕变，财力日竭，恐无收书之望矣！念之慨然。

丁丑（1937）小除夕题：“敬夫以宋监本《毛诗》归我，力不能收，然《鄱阳集》、《湓水集》、《阳春白雪》三书，终未能忘情也。”（此条下加注：己卯（1939）二月十七日归我）。

丁丑（1937）小除夕，敬夫拟以此书（绍曾案：指宋监本《毛诗》）见归，索八百元。余度岁之资仅乃足用。实无余力收书，只得婉谢之，两美之合，遂成虚愿，世事如斯，衣食且恐不瞻，即见好书胜此者，亦徒唤奈何耳。

“戊寅（1938）九月，见《周易本义》，只饱眼福而已，伤哉！老骥记。”

戊寅（1938）十二月廿日题：“两年以来，财力极绌，已入不敷出，何能有余钱收书。杨氏书近见金刻《通鉴节本》，纸印精美，可称绝品，望洋兴叹而已，伤哉！”

“己卯（1939）二月十七日，金本《通鉴节要》与宋监本

《毛诗》同归余斋，真大费矣。”

“《蛻庵集》近为邃雅斋从济南收得，索直奇昂，不能买矣。己卯（1939）四月。”

“《蛻庵集》、《闻见后录》两书，皆归邃雅斋，庾丈为我偕价，顷始成交易，只得举债收之，并售北京自来水股票以偿债，其痴不可及也。己卯（1939）十一月十三日记。弢。”

又题：《鄱阳集》、《溢水集》、《蛻庵集》、《阳春白雪》四书，为余最所心慕者，今得其一，不知其他三书尚有缘归我否？

“斐云自北平来，为我购得校本《博雅》，偕价奇昂。其书在海源阁为下品，实不能称其值也。而余之浪费金钱于无用之地。益可惜矣。庚辰（1940）十月二十三日弢翁识。”

上面所举，全系《楹书隅录》和《续编》的题识，下面再来考察一下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的题识：

“支硎山人云：‘钱物可得，书不可得，虽贵当弗校。’此言可谓先获我心。噫！书痴恐终不可医矣。甲戌（1934）十二月朔，弢翁记。”

“近日举债，收书力已疲矣，尚有不可不收者数种，特列于左方。乙亥（1935）十二月。

淳熙本《史记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尔雅》、《百家注柳文》、《鄱阳集》、《甲乙集》、《阳春白雪》、《溢水集》、《舆地广记》北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蛻庵集》。

目外之书三种加一种：《孟东野集》宋本、《注心赋》（绍曾案：原作《心赋注》，今改正。）元本、《糖霜谱》三种黄校本、（《尔雅》元本）、《宝晋山林集拾遗》抄本。

“余得海源阁书凡五十种（实五十一种，元本王注苏诗与沅丈易者），敬夫让我者三十种（实三十四种），敬夫让之他人，

余辗转获之者二种(一得之庾丈，一得之书贾)，匪劫以后流转市，余搜求得之者十二种，著目外三种，何时自阁中散佚则不可考矣。壬午(1942)正月初九日病起书。(绍曾案：以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开列书名，因与前引大同小异，从略。)

呜呼！山人之言真是太平气象，若今日则书可得，钱物不可得，不仅望洋兴叹而已。丙戌(1946)四月老弢书。”

“力不足收书，久矣。顷见元本《尔雅》为数年来所心向往者，遂以重值归之，大喜亦大费矣。戊子(1948)正月廿八月弢翁记。”

从上面这些题识中，我们可知弢翁最关心海源阁遗书的命运，时刻注视着它的去向。他收藏的海源阁遗书，是二十余年积累的结果。为了收购一部好书，往往不顾家庭生计，不惜举债，甚至出售股票来达到他的目的。每当他购到好书、如愿以偿时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他记录下来，表示内心的喜悦。万一谐价不成，或者为别人捷足先登，总是感到满怀惆怅。最使他感到痛惜的，三十年代初，当他向杨敬夫购到宋本《新序》时，还有几部宋版书无力购买，后来其中的宋本《荀子》、宋本《说苑》、宋本《管子》、宋本《淮南子》、宋本《击壤集》被日本人买去(案：指大连图书馆)，他表示惋惜不止。曾在《楹书隅录》宋本《荀子》的题识中说：“敬夫索四千五百元，因手中极窘，遂为日人购去，最堪痛惜。盖当时财力仅能收《新序》一书也。”后来又在宋本《新序》题识中说：“余收此书时，若能举债并《说苑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淮南子》同收之，岂不大妙乎？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，亦自有短处。”现在获知，大连图书馆收购的六种海源阁书，抗日战争胜利后尚保存完好，不幸在大连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，却终于流出了国外，这是弢翁万万想不到的。他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“书痴”，“其痴不可及”，其实他并不痴。弢翁一生最善于理财，而又不惜为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付出高昂的

代价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、大仁、大勇。对我们国家来说，这是对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，非徒海源阁的功臣而已。

其四，弢翁对《楹书隅录》的批注，扼要地记录了海源阁宋元秘本的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纸张、装潢、评版刻之优劣，辨版本之真赝，给后人研究版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。关于《楹书隅录》收藏印记的补充和订误，对考辨图书的授受源流，尤具有重要意义。细究弢翁《楹书隅录》的批注，内容有详有略，详细的有一、二百字，简单的只有几个字，但都要言不繁，动中肯綮。多数是记录版式、行款、字体、纸张、装潢，讳字、刻工，评版刻之优劣，辨版本之真赝。也有说明图书的归属的。例如：

宋本《周易本义》十二卷：白麻纸，精。

宋本《周礼》十二卷：间有漫漶处，左右双边，白口。刻工姓名皆浙匠：王珙、沈亨、才、李、正、涂、林、卓宥、卓、毛。

宋本《礼记郑注》二十卷：白纸，字体古拙，有极精者，四边甚宽，有圈点。又批：此撫州公使库刻本，初印精美，无一补版。

宋本《说文解字》三十卷：白麻纸，印工尚佳，有墨钉，归澄中。

宋本《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》五卷：白纸，精美，阔大，东莱。

宋乾道本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：极精，王晋卿买去，归澄中。

宋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四十二卷：黄纸，明印不精。

宋本《建康实录》二十卷：白纸，不精，有缺叶。

北宋本《荀子》二十卷：钱佃本，印晚，白纸，日本，顾跋。又批：“印不精，疑有明时补版，”此说非是。

北宋本《新序》十卷：桓构缺笔，纸印精美，间有虫蚀处，修补完好，有朱笔评点。士礼居原槧，孙延题签，旧锦

套。

北宋本《说苑》二十卷：不及《新序》（朱），白纸（朱）日本，莧跋。

宋本《脉经》十卷：明本染纸，杨氏手跋。

宋本《证类本草》三十二卷：此蜀大字本，黄纸，白口，《本草衍义》是江西刻，由王之霖归之广东莫氏。

北宋本《淮南鸿烈解》二十一卷：印不精，建本，密行细字。

宋本《新刊履斋示儿编》二十三卷：黄纸，小版心，黑线口，左右双边，下间有字数。孙奕序，半页六行，行楷。此书疑是元本，江南刻。

宋本《自警编》无卷数：黄麻纸，不精。

宋本《南华真经》十卷：极精。又批：白纸精印，司，宋讳至构字止，以字体審之，是南宋初仿北宋重雕者。又批：此非杭本，乃湖北本，刻工姓名与《建康实录》同，纸墨亦相近。又批：此书无补版，纸印比《建康实录》为佳。

宋本《离骚草木疏》四卷：纸印不甚精，版心大，字体极古雅，墨色极浓，书中逸品。

北宋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：白纸印不精，有刻工姓名：施骏、施章等，盖浙本也。书题首行剗补“宋本”、“甲”印疑伪。此书不及瞿氏藏江西刻本。

影宋精抄本《鲍氏集》十卷：毛抄，宋本，甲，精美，今已归澄中、庾楼。又批：白纸，宽大，精美，汲古原装，士礼原槧。宣德笺书衣纸、书套，皆毛氏原物，完整如新。又批：毛抄本余见二十余种，当以此为第一。又批：此书为庾丈收得，欲与余换书、未果，今归澄中，颇得善价也。丙子，十二月。

北宋本《王摩诘文集》十卷：汲古原装，纸印精美，完整无缺，白纸。“宋本”、“甲”二印，乃汲古阁印，余藏《寒山子诗》正同，独无毛氏名印，可异。此宋本之神品。

宋本《韦苏州集》十卷：此是明本。

宋本《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》四十五卷《外集》二卷：蜀本（朱），字大悦目。

北宋本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：白纸印，有刻工姓名，可与《王摩诘集》颉颃，仅差一等。又批：余得残宋蜀本而不得此书，可怅之至。又批：有割圈点处，小号通连共一百六十八页。慎字缺笔。士礼居原匣，归李氏后已破损，可惜之至。李氏恶印，为书减色。

宋本《孙可之文集》十卷：精美，亦多描失虫蚀。又批：此书议价未谐，由王子霖售之莫氏。

宋本《唐求诗集》一卷：黄纸，精，黄氏蝶装。

宋本《范文正公集》二十卷，《别集》四卷：元本。

宋本《元丰类稿》五十卷《续附》一卷：此大德本，与故宫所藏同。故宫本黄纸，此白。

明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五十卷：纸印极劣。又批：黄纸，极漫漶，补版甚多。

元本《重校正唐文粹》一百卷：明本，染纸。

元本《梅花百咏》一卷：黄纸，精。黄氏蝶装，莛跋。

元本《稼轩长短句》十二卷：黄纸，大版心，行楷极雅，莛跋。又批：元刻中甲观，大字宽行，行楷古雅，黄纸，黄氏原匣，上黑线口，下白口，上字数，下间有刻工：祝、周。

宋本《花间集》十卷：字体古拙，或是北宋，白纸，印不精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李珣《南乡子》存七首。

(以上批注中标有“朱”字的系指朱批)

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，弢翁非常注意宋元秘本的字体、纸张、黑色、印工、装潢，从而衡量版本的优劣。在鉴别版刻的时代和地点时，都借助于刻工和避讳字。他一再提到“毛氏原装”、“汲古原物”、“黄氏原椁”、“黄氏原匣”，突出地体现了他对宋元秘本的爱护，不仅注意书的版本，而且重视它的外表。装潢精美可以增加书的身价。弢翁对海源阁书的“善保旧装”，确是一大特色。他自己的藏书中，凡是遇见“汲古原装”、“黄氏原椁”、“黄氏蝶装”，都倍加珍惜。相反的对装潢恶俗、或印刷粗劣的，在批注中都要加以贬斥。北宋本《孟东野诗集》对德化李氏的恶印，也提出了批评。弢翁某些批注，有一批再批而至三、四批的。每批都另有新意。弢翁对版本的真贋，一到眼便能鉴别。自己没有十分把握的，便表示存疑，态度极为审慎。如宋本新刊《履斋示儿编》批注：“此书疑是元本”，即是一例。实际上这部书确实是元刘氏学礼堂刻本（见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）。弢翁对印记的真伪，也不轻易放过。如北宋本《陶渊明集》，本来是一部佳刻，但书估无知，硬要加上“宋本”、“甲”两方伪印，证明是汲古阁旧物，这就等于“佛头着粪”。弢翁对版本高下的评论，如说宋本《离骚草木疏》是“书中逸品”；北宋本《王摩诘集》是“宋本之神品”，影宋精抄本《鲍氏集》毛抄中“当以此为第一”，元本《稼轩长短句》是“元刻中甲观”，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。北宋本《陶渊明集》，并不因为他自己收藏，有意抬高它的价值，而是说“此书不及瞿氏藏江西刻本”。又如北宋本《荀子》有人以为“印不精，疑有明时补版”，他给予否定。认为宋本《说苑》，不及《新序》。弢翁批注不但注意书的去向，而且往往从中可以了解不少书林掌故。上面有的例子提到“归澄中”（陈澄中）、归“东莱”（刘少山）、归“庾楼”（张允亮），归“李氏”（李木斋）、归“莫

氏”（莫天一）归“日本”（指大连图书馆）。书落入谁氏之手，都要经过一番较量。例如宋（乾道）本《史记》，弢翁批注：“此书余谐价三千二百元已成，为书估王晋卿夺去，六千元归之澄中。”宋（淳熙）本《史记》：“此书颇思购之，顷闻已归东莱银行刘氏矣。”这对我们了解书籍的授受源流，很有用处。若不是弢翁留下批注，谁能想到乾道本《史记》竟以六千元的高价才落入陈澄中之手，又谁能想到弢翁曾经为这部书跟杨敬夫打过交道。又如校宋本《新序》弢翁批：“此书为匪徒抢失分散，邢氏先收到一册，后邃雅斋又收一册，余力劝归之邢氏也。”我们原先只知道校宋本《新序》为邢赞亭收藏，转归北图，但不知道这部书也有它散而复合的历史，从中起作用的却是弢翁。弢翁批注，对我们了解海源阁书的授受源流还提供了间接的证据。李木斋收购的三种海源阁书：宋本《孟浩然集》、北宋本《孟东野诗集》、宋本《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》，弢翁都有批注，证明傅沅叔所云“二孟一黄为李木老所得”（见《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》182页51）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可是宋本《孟浩然集》，见于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，而不见于《李氏木犀轩善本书目》。说明宋本《孟浩然集》在归南海潘氏宝礼堂之前，确实先归李氏木犀轩。尽管潘李之间如何成交，缺乏文献记载，但由李氏转归潘氏，是可以肯定的。弢翁批注有鲜为人知的资料，如影宋精抄本高诱注《战国策》三十二卷，弢翁批注：归“齐鲁大学”。这在我所见到的北图藏《海源阁藏书目》王文进批注本、中华书局藏《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》佚名批注本都没有这一条。这部书在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，由齐鲁大学图书馆转归山东省图书馆，证明弢翁知见准确无误。

弢翁批注中对“顾跋”、“莒跋”十分重视，它本身就表明书的价值所在。除标注“顾跋”、“莒跋”外，有下列10种书都标有“赋”字：

宋本《张先生校正杨氏易传》二十卷：黄纸，精，东莱，
赋。

宋本《会稽三赋》三卷：书不精，赋，莧跋。

北宋本《新序》十卷：极精（朱），白纸（朱），赋，莧跋。

北宋本《淮南鸿烈解》二十一卷：印工中等，日本，顾跋，
赋。

北宋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：文氏，宋本甲，白纸印不精，
赋。

宋本《孟浩然集》三卷：德化李氏（朱），精美（朱），莧跋，
赋。

北宋本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：德化李氏，精美（朱）莧跋，
赋。

宋本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十二卷《附录》一卷：黄纸不精，
赋。

宋本《三谢诗》一卷：印不精，册页（朱），日本，莧跋，
赋。

宋本《云庄四六余话》一卷：不精（朱），东莱，莧跋，
赋。

经我与顾广圻《百宋一廛赋》核对，除宋本《张先生校正杨氏易传》外，其余九条，均见于《百宋一廛赋》，证明标明“赋”字的是指《百宋一廛赋》，这对衡量版本价值，有重要作用。可见弢翁的认真不苟，在批注时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至于宋本《张先生校正杨氏易传》，可能是弢翁一时笔误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弢翁对这些书的评价，有他自己的见界，例如宋本《会稽三赋》、北宋本《淮南鸿烈解》并不因为有莧跋、顾跋，并见于《百宋一廛赋》，就认为精美，照样指出它的缺点。

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例须于题识后著录藏书印记，目的是为了

弄清藏书的授受源流，当然需要准确无误。杨氏《楹书隅录》也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，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。弢翁每过目海源阁书，即使不是他自己收购的书，总是要认真核对原书与《隅录》著录有无差异。例如宋本《周易本义》，并非他自己收购的书，经他核对，发现《隅录》所云“又一朱文长方木记，其文云澧记官书”，实际上是“礼部官书”。弢翁批注：“沅丈藏此书半部，亦有礼部官书印。”《隅录》著录成“澧记官书”，当然是错误的。又如宋本《周礼》，《隅录》著录有“秘书少监”印记，经弢翁核对，应该是“秘书外监”。又如宋本《说文解字》，《隅录》著录有“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印”，经弢翁核对，应该是“毛奏叔”，不是“毛叔子”，著录的“苏斋”应该是“苏公”。“西戴大章”，应该是“西戴大郎”；“许瀚之印”应该是“许瀚私印”；“汪喜孙”，应该是“汪喜荀”。又如校影宋精抄本《佩觿》，《隅录》著录“己未五月二日读毕，虞山毛扆”，经弢翁核对，应该是“己未五月二十日读毕，海虞毛扆”。又如校明抄本《画鉴》：“容十”为“知十”之误。“姑余吴岫家藏”，为“姑苏吴余家藏”之误。类似这样的改正讹字，都是细心鉴别的结果。另一种情况是补空白。例如宋本《周礼》，《隅录》著录“高□”的印记，高字下用墨框表示，显然是无法辨认。经弢翁核对，应该是“高岱”。又如宋本《说文解字》，《隅录》于“延令戴大章”下著录“字□□一字南轩”，“字”字下用墨框表示空缺，经弢翁核对，应该是“赧赧”二字。这对鉴别藏家，很有好处。第三种情况是增补脱漏。这类例子很多。例如宋本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，弢翁增补了“宋本”朱文腰圆、“澂印”白文方、“镜汀”朱文方、“三十五峰园主人”朱文方、“汪印文琛”白文方、“士钟”白文方、“阎源父”朱文方七方印记。又如宋本《周礼》弢翁增补了“红术轩”朱方楠“汪”朱文方、“丙午”朱文长方、“小字阿买”

白文方、“礼堂绍芬”白文楠、“红术轩”白文方、“古唐里人”朱文方“一经可读”朱文方八方印记。宋本《说文解字》，弢翁增补了“汪氏延熙”、“仲恪”、“观寺”三方印记，以及杨氏海源阁诸藏印。增补脱漏印记中有很重要的，例如宋本《孟浩然诗集》补“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”印记，说明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，先归文登于氏，然后归杨氏海源阁。弢翁增补更多的是：《隅录》著录的印记，原来都未加注“朱文方”、“白文方”、“朱文长方”等一类印记的特征，弢翁逐一核对原书，分别标注印章的特征，这种认真细致的精神，在收藏海源阁遗书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中，并世无第二人。

其五、弢翁在《楹书隅录》批注中，更为重要的是校订了《隅录》文字的舛讹，增补了黄跋，以及黄跋的脱文，间或对黄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弢翁每见到海源阁遗书，总是把书内前人的评跋，与《隅录》核对，往往发现两种情况：一是《隅录》移录的评跋，与原跋有文字上的出入；二是《隅录》移录的评跋，并非前人评跋的全部，而是有所删节。其中特别是黄跋，被删节的不少。在当年杨氏看来，也许认为某些黄跋，并不重要。从今天来看，被删节的黄跋，都是记录校勘的过程，并非可有可无。为了如实地反映前人评跋，弢翁逐一加以增补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先说校订文字的舛讹。这种例子很多。如宋本《周礼》杨绍和跋：“此本每半叶十三行，行大二十五字，小三十五字。”原跋作“此本每半叶十三行，行大二十五六七字，小三十五六字。”宋本《咸淳临安志》傅王露跋：“残缺虽夥，而补抄本亦复端雅可观。”原跋作“虽残缺甚夥，而补抄亦复端雅可观”。杨绍和跋：“为延令故物”，“为”下有“东海”二字。“此本之存不啻星凤矣”，“星凤”原跋作“硕果”。“不知归诸何人”，原跋作“恐堕之劫中。”宋本《陶靖节先生诗》杨绍和跋：“松声山房”，原跋作“松磐山房”。宋本《孟浩然诗集》黄丕烈跋：“余亦断不忍

舍者也”，原跋“忍”作“肯”。“今得宋刻正”，原跋“正”下有“之”字。宋本《唐求诗集》黄丕烈跋：“因余所好收宋本”，原跋“收”作“为”。元本《苍岷先生金石例》顾广圻跋：“粗读一过”，原跋作“粗读一遍”。杨绍和跋：“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二字”，原跋作“行二十一字”。元本《东坡乐府》黄丕烈跋：“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，”原跋“意”作“竟”。

“千里犹不足”，原跋“犹”上有“意”字。此类出校异文，《隅录续编》中更多。如校本陆游《南唐书》顾广圻跋：“沿袭旧讹”，原跋“讹”作“讹”。“藏诸篋中久矣”，原跋“藏”作“弄”。黄丕烈跋：“乙丑冬日得陆敕先手校钱遵王抄本”，原跋作“乙丑冬十日”。“今乃豁然顿悟，”原跋“悟”下有“矣”字。甘止醒人跋：“原陆取校者必此书矣”，原跋“取”作“所”。校本《中吴纪闻》黄丕烈跋：“辛未四月有四日”，原跋“有”上有“二十”二字。又黄跋：“中一二佳字”原跋作“中有一二佳字”。“仅以墨笔识之”，原跋作“仅以墨笔校之，其陈校则以朱笔识之”。校旧抄本《芦浦笔记》、《杨公笔录》黄丕烈跋：“故贾人之踪”，原跋“踪”作“迹”。“记此一段感慨于此”，原跋“记”上有“即”字。明铜活字本《开元天宝遗事》黄丕烈跋：“后七行第五字使原作须”，原跋“使”作“便”。“虽重不惜矣”，原跋“不”作“弗”。校本《剧谈录》黄丕烈跋：“以开万楼所藏旧抄本校首多序一篇”，原跋“首”上有卷字。“书以旧为佳”原跋“旧”下有“本”字。校本《江淮异人录》出校异文九条，校明抄本《录异记》出校异文七条，均极重要。校宋明抄本《李群玉诗集》黄丕烈跋：“合上中下三卷目录”，下脱“及卷中诗大段相近，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”十八字。更为严重的，将黄跋时间写错，如校旧抄本《蛺庵诗集》误“丁卯秋七月”为“丁巳秋七月，误“九月七日”为“七月七日”。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以上所举《隅录》和《续

编》这些文字上的舛讹，有形近而误的，有声近而误的，有颠倒、脱漏的。有些文字虽义可两通，但终非作者本文。说明杨氏当年虽经凤阿舍人细心校勘，仍不免忙中有错。其中如“今得宋刻正之”，“千里意犹不足”，若脱去“之”字、“意”字；“此种宝物竟以贱值得之”，将“竟”误成“意”；“书以旧本为贵”，若脱去“本”字，非但读不成句，文意亦将含糊不清。至于脱漏大段文字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晚清之际，吴县潘祖荫辑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，缪荃孙又辑《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》、《再续记》，其中海源阁所藏者，黄跋均抄自杨氏《隅录》底稿本，凡是《隅录》舛讹者，都不免沿误。后来缪氏又同章钰、吴昌绶汇辑《菴圃藏书题识》，舛讹一仍其旧。因此弢翁所做的校勘工作，不但足以改正《隅录》的讹文，而且对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《菴圃藏书题识》同样起到订误的作用。

再说增补前人评跋。例如明抄本《山海经》，弢翁在序末移录至元癸巳溪山道人田紫芝刻书题识一则，可证此本确从元本录出。宋本《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》，补嘉靖三年重阳日文彭题识一则，可见此书不仅为文氏弄藏，且曾用功研读。宋本《楚辞集注》补孙鉴(子在)跋，可与杨绍和跋相呼应。宋本《花间集》补杨保彝“光绪乙酉十月重加手装”题记一则，可知此书杨氏爱惜备至。校本陆游《南唐书》补顾广圻过录陆敕先跋又一则，可见此书陆敕先曾与钱罄室手抄本校一过。至于增补的黄跋更多。例如校宋明抄本《刘子新论》补黄跋三则，校明抄本《西溪丛语》补黄跋四则，校宋抄本《宾退录》补黄跋二则，校宋本《春渚纪闻》补黄跋十二则，校宋明抄本《李群玉诗集》补黄跋二则。增补的这些黄跋，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校本的进一步了解。对于增补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《菴圃藏书题识》，同样是重要的。

弢翁在批注中间有对黄跋提出异议之处，例如校宋明抄本《李群玉诗集》，黄跋中有一段话：

予藏旧抄本有三本，一叶氏抄本，一冯氏抄本，一毛氏抄本，向因未见宋刻，就此三本核之，似冯氏较胜，因有缺处独全也。

弢翁在“毛氏抄本”旁批：

此本实出冯本，所异者，唯王内人《琵琶引》末补缺耳，未知何所本？

又在冯本“缺处独全”旁加批：

此尚误。毛本王内人《琵琶引》末独全，非冯本也。这显然是对黄跋提出质疑，进而否定冯本“缺处独全”的说法。这类批注，证明弢翁是有他独立的见界的。

以上谈了五个问题，无数事实证明，弢翁对海源阁遗书，情有独钟，其收藏之丰，经眼之广，鉴别之精，校勘之勤，用力之劬，以及典藏的尽善尽美，都非近现代一般藏书家所能望其项背的。弢翁一生最大的贡献，在社会动荡的年代，竭数十年的心力，收藏一大批稀世珍本，不致落入市侩之手，甚至流出海外，并于海宇澄清之日，扫数奉献给国家，使国家得以永远保存，充分发挥它的作用。尽管海源阁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但它的价值，是无法用数字来表明的。弢翁在1942年手订书目上给子孙们留下几句话：

生计日艰，书价益贵，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。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抗衡，然数十年精力所聚，实天下公物，不欲吾子孙私守之。四海澄清，宇内无事，应举赠国立图书馆，公之世人，是为善继吾志。倘困于衣食，不得不用以易米，则取平值也可。勿售之私家，致作云烟之散，庶不负此书耳。

一个“天下公物”，一个“不负此书”，这就是弢翁藏书的最终目的，也是弢翁最崇高的思想境界。

这里还应该指出：弢翁是近现代藏书家中有数的几个校勘学

家之一。弢翁不是为藏书而藏书，而是为读书而读书。傅沅叔在《周君叔弢勘书图序》中称赞他“治事之隙不辍丹铅，常观手校群书，皆字画端谨，朱墨鲜妍，颇具义门风格，决不效菟圃之火枣糕、赤练蛇见訾于后世也”。从弢翁的题识和批注，以及对《楹书隅录》的校勘完全可以得到证实。这里不妨再举两个例子：一个例子，他在明万历程荣刻汉魏污书本《新序》题识中说：

宋本《新序》，海源阁旧藏，每半叶十一行，每行廿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下记刻工姓名，曰洪茂、洪新。卷五、卷十末叶纸背有“徐昌期印”四字楷书墨记，缺笔至构字止，盖绍兴时刻本也。庚午（1930年）二月，沅叔三丈授此书命校，因取宋本对勘一过，凡增改三百许字。其钱木斋手跋一则，黄菟圃手跋三则，金轡庭手跋一则，具见《楹书隅录》，不复录云。建德周暹谨志。

另一个例子，他在上海涵芳楼影印明弘治本《孟东野诗集》题识中说：

己巳（1929年）正月初四，从李十兄少微借得海源阁旧藏宋小字本《孟东野集》，取校此册，凡四日而毕。宋本版刻精雅，字体不一，缺笔至“慎”字止，脱误甚多，然因其形声以求之，可十得八九，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者，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。黄菟圃所藏宋蜀本《孟集》残帙今在余家，暇时当再校之。正月初七日叔弢记。

这两则题识，都是以海源阁书来取校，校勘结果，一则用宋本《新序》增改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本三百许字，另一则则发现宋小字本《孟东野集》“脱误甚多”。弢翁虽未明言宋小字本不如影印明弘治本，但“脱误”是明显的事实。说明“书所以贵旧本者，非谓其概无一讹”（卢文绍语），弢翁以为宋小字本固多脱误，“然因其形声以求之，可十得八九，较之无知妄改远失本意

者，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！”这类深刻的体会，不是善读书、善校书者是不能道的。无怪傅沅叔说，“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，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，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，非子而谁属耶”？傅沅叔如此推崇，决非过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正误一则

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页十三右《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》条，王重民先生在此条提要中作《四库总目》纠谬一则，力证该书作者为冯复京而非冯应京。文末引《言志》进而述郑钟祥乃系从《四库总目》之误云：“《言志》谓言如泗光绪戊戌所修志，其《复京传》云：‘复京字嗣宗，强学广记，不屑为章句小儒，少业《诗》，钩贯笺疏，著《六家诗名物疏》六十卷。’然则言如泗何尝误，乃郑钟祥等为《总目》所误也。”按：文中所谓《言志》即言如泗任总纂的《常昭合志》，此书刊于乾隆六十年，言如泗亦为乾隆间人。作“言如泗光绪戊戌所修志”，误。《清史稿》传称“乾隆三年，高宗临雍，如泗以贤裔陪祀，赐恩贡生，充正黄旗官学教习。……”王重民先生所云“光绪戊戌（二十四年，1898年）所修志”当系误认该年丁祖荫活字翻印本为原本而致。《言志》的上述二版本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第328页均著录，可参。

• 蔡贵华 •